

杨
YANG
晦
HUI
选
XUAN
集
JI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吴泰昌
编



杨晦选集

吴泰昌 编

YANGHUI XUAN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乐秀镐

杨 晦 选 集

吴泰昌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3 字数 359,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册

书号：10078·3787 定价：2.85元

从癸亥年到癸亥年

——怀念杨晦同志

冯 至

工作余暇，整理旧书，在《两当轩全集》第一册封面上看到我写的四个字“癸亥年冬”，我猛然一怔，今年不又是癸亥年吗？建国以来，用公历纪年，我很少注意用天干地支推算年份，只有时翻阅日历，知道去年是壬戌，今年是癸亥，也不曾记在心上。可是《两当轩全集》第一册封面上的这四个字，却使我心潮起伏，许久不能平静。封面上写的癸亥年，是一九二三年，这是我一生中很有意义的一年。在这年我首次在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我的新诗试作，在这年我结识了后来共同创办《沉钟》周刊和半月刊的朋友，其中对我影响最大、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杨晦同志。这几个朋友都先后逝世，杨晦同志也在今年（又一个癸亥年）与世长辞了。而这部《两当轩全集》则是我和杨晦一起散步，在东安市场一家书店里买到的。两个癸亥年，整整一个“甲子”，是整整六十年；年份的偶合，并不含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在我们生者与死者之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排解的深情。

一九二三年，我十八岁，在北京大学从预科转入本科；杨晦二十四岁，他一九二〇年已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不同的中学教过三年书，这年暑假他辞去厦门集美学校的教职，到北京孔德学校来教“国文”课。我和他初次相遇，是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张凤举的家里。认识后互相来往，很快就成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孔德学校校址当时在北京东华门内北河沿，与北京大学第三院毗邻，杨晦住在学校里，他住室的窗子正对着北大三院的操场。傍晚，我常到那广阔的操场散步，有时把他的窗子敲开，一内一外，两人便靠着窗口交谈。在天已黑了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时，我就越窗而入，直接到他的房里，用不着绕个大弯子去走孔德学校的校门。他教的是“国文”，却大量阅读欧洲的戏剧，他乐于向我谈他读过的剧本的情节和读后的感想。他以极大的兴趣谈莎士比亚和希腊悲剧，在当代剧作家中他最欣赏爱尔兰的约翰·沁孤和比利时的梅特林克。这年冬天，他倾注极大的精力在课外给学生排演梅特林克的童话剧《青鸟》，并取得成功。我那时很少读剧本，我最初一些西方戏剧的知识，多半是从他那里得来的。

杨晦出身于东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有一种蔑视艰难困苦而勇于同艰难困苦作斗争的坚强性格，由于看到社会上种种的不平和农民经受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也时常流露出忧郁的心情。他坚强的性格和忧郁的心情在西方的某些悲剧里得到共鸣，他谈讲那些悲剧的情节，象是在述说自己亲身的经历。

他在一般人面前沉默寡言，若是遇见他所憎恶的人，往往

神情枯冷，甚至厌形于色。但是在朋友与青年学生中间，他内心里则是一团火，他对他们的关怀，大至思想意识，小至衣食住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个人一生中有所向上，有所进步，许多地方都是跟他对我的劝诫和鼓励分不开的。他对待学习和事物的认真态度也使我深受感动。

他本来学的是哲学，英文只能阅读，这时他钻研西方戏剧，认为读剧本必须掌握口语音调，他每月收入有限，却不惜付出昂贵的学费跟一个英国人去学诵读和口语。约在一九二八年，北京大学有一位德国的讲师讲授古希腊语，他为了将来能读希腊悲剧原文，也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去学。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年，体力已经很衰弱了，他还买了些德语字典，自修德语，以便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里不过仅从学外语方面，说明他学习如何认真，至于他教学与治学的严肃态度，就不是这篇短文里所能论及的了。同时他待人处世，不肯敷衍苟且，他不断跟他环境内接触到的虚伪的世故、勾心斗角的行为、尔虞我诈的争夺进行斗争，自己经受多大的损失也不后退。解放前他在学校里教书，经常受排挤，受迫害，可是他对反动的黑暗势力从不屈服，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精神。我青年时好读书不求甚解，不象他那样肯下死功夫，靠着一点愚蠢的“聪明”写些轻飘飘的诗文；我更不认识中国的社会，只从书本上知道些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眼前看不到光明和美，只觉得是一片黑暗与丑恶时，便发一些无谓的感慨，此外就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而已。在和杨晦的交往中，我有时感到自愧，想起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里的几句话：“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

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我暗自思忖，我与杨晦的友谊会不会只是偶然的相知呢？但事实上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主要是由于他的“不堪”经常纠正了我的“多可”。

解放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以前，许多大学毕业生耻于在反动政府属下的机关里做事，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到国内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学或师范学校去教书。那些学校的校长对教员握有聘请和解聘的大权，他们几乎都与官方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其中比较开明的往往背后有个靠山，敢于延聘进步教师，传布新文化、新思想，不过这是极少数；另一种是善于应付，能左右逢源，为了自己的声誉，找几个有声望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给他支撑门面，但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影响他的饭碗；等而下之的，是以推行反动统治、镇压进步势力为能事，若是由于一时“疏忽”请来了一个进步教师，他一经发现，就对这教师进行迫害。这三类校长“领导”下的学校，杨晦都经历过，从中懂得许多新的“儒林外史”。可是杨晦一度工作过的孔德学校则不属于以上的几种类型，由于它成立时蔡元培兼任校长，校内充满自由空气，反动势力没有立足之地，师生感情融洽如一家人。但它也有缺陷，学生培养得犹如温室里的花朵，不经风雨，看不见世路的坎坷，人间的险巇。我在一九二七年大学毕业，孔德学校负责人约我到 he 那里去教书。这时杨晦已在他处工作，不在孔德学校，他对我说：“孔德学校是个好学校，但对你没有好处，你需要认识社会，在那里你认识不了社会，你应该到艰苦甚至黑暗的地方去，好好地锻炼锻炼。”我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话，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了哈尔滨一个中学的聘书，登上去东北的途程，难割难舍地离开了北

京。那时整个的东北三省长期在奉系军阀愚昧而残酷的统治下，更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而哈尔滨的官僚买办浑浑噩噩，荒淫无耻，使这座松花江畔美丽的城市充满了金银气、酒肉腥和贫苦劳动者的血泪。我把我在哈尔滨感受的孤单与寂寞写信给北京的朋友，杨晦不断地写信给我以鼓励。这些信都早已散失了，只在我的诗集《北游及其他》的序里抄录过一封信里的几句话。这几句话对我太有意义了，我以无限珍惜的心情愿意把它们在这里再抄录一次：“人生是多艰的。你现在可以说是开始了这荆棘长途的行旅了。前途真是不但黑暗而且寒冷。要坚韧而大胆地走下去吧！一样样的事实随在都是你的究竟的试炼、证明。……此后，能于人事的艰苦中多领略一点滋味，于生活的寂寞处多做点工，那是比什么都要紧、都真实的。”这样的话，我现在读着，还感到无限亲切。

人世间绝大部分人都追求幸福，但也有少数人好象是一心一意寻找苦难。杨晦经常称道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士和希伯来传说中的约伯。前者为了反对倒行逆施、背信弃义的宙斯宁愿在无止境的囚系中永不屈服；后者经受严峻的考验，遭遇极大的灾难也不丧失对于神的信心。杨晦曾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士》从英译本译成中文，也计划把《旧约》里的《约伯记》加工成为一部文学作品，并拟将这两部西方的“古籍”合印在一起。他说：“这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教科书”（可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只有他译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士》作为单行本出版）。由于这种精神，他不只一次地向我说，“我从来不过多地夸奖你，夸奖对你没有什么好

处。将来你可能遭逢不幸，受到饥寒和凌辱，甚至没有人理你，到那时看你如何对待，你若能受得住这样的考验，才会有所成就。一般庸俗的幸福生活，不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他说这话时，我感到的并不是凛若冰霜，而是春风般的温暖。遗憾的是，他所说的那种“不幸”，我并没有遇到过（也许在四十年后的十年浩劫中我尝过一点他所说的那种滋味吧），可是庸俗的幸福，我则从来没有追求过。

一九三〇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德国学习，杨晦曾写信给我，说要抓紧这个机会，认真读几年书，不要沾染当时一般留学生的习气。在这些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高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我一九三五年九月回国，在上海首先见到杨晦，当天晚上，没有交谈多久，他就给我以当头棒喝：“不要做梦了，要睁开眼睛看现实，有多少人在战斗，在流血，在死亡。”这时他已起始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在上海参与党所领导的文化活动。后来我回到北京，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首诗，他读到了，立即写信给我，大意说“你的诗在技巧上比过去成熟些了，但是你的诗里对待事物那种冷冰冰的态度，我读后很不舒服，我不希望你写这样的诗”。三十年代与二十年代不同，中国社会和革命形势以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杨晦对于他的朋友仍然是那样热情真挚，只要他看到我有什么缺陷，他都毫不留情地给以批评。

一九三六年暑假后，我和杨晦在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教书。那时的上海，每个学校甚至每个班级都是进步势

力和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场地。同济附中除了个别国民党党棍外，一般的教员“明哲保身”，只讲授本门课程，不敢触及时事，虚与委蛇地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杨晦担任历史课，他在课堂上经常宣传抗日，分析时局，反对国内与国际的法西斯主义，旗帜鲜明，毫不含混，在学生中间发生日益扩大的影响，同时也召来反动分子的嫉恨。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连同附设高级中学经过浙江金华迁移到江西赣县。在一九三八年暑假，校内校外的恶势力互相勾结，对杨晦和我进行迫害，致使杨晦离开同济附中，我也在一九三九年初挈着病妻幼女跟同济到昆明后，转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我在昆明一住住了七年半，这期间杨晦先是在广东广西流离不定，随后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和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尤其是一九四三年他到重庆后，在党的直接影响下从事文艺活动和教育工作。他的论文集《文艺与社会》主要是他在这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理论得到的成果。在他评论中外作家和作品的文章里也含有自我批评的成分。这中间他给我的信里我记得有这样的话，“你在同济附中两年多的工作和政治态度还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你在西南联大，这是北平和天津三个最高学府联合起来的大学，我担心有人会把‘京派’的士大夫气带到这里来。时代不同了，那种士大夫气也不会原封不动，不过你要警惕，还要保持在同济附中时的那股朝气。”（大意）

以上从我的记忆里写出他对我说过的和写过的一些话。这类的话，我相信他对其他的朋友和一部分学生也说过不少，当然，内容是不会相同的。

解放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他在十五个学校教书，中间还有时失业；解放后，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直到逝世，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象杨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是多么颠沛流离，在新中国生活是多么安定。到一九六四年为止，我在北大西语系工作，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区燕东园里，交往的机会反而稀少了。在繁忙的五十年代，他兼任中文系主任，我兼任西语系主任，彼此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很少有时间互访闲谈。他也许这样想，他的朋友们都各自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工作，用不着他来关心了。可是有两件事，我还记在心上。一件是在一九六四年暑假，北京大学党委为了贯彻当时对知识分子和教育文化估计错误的“左”的路线，曾召集党员干部在十三陵北大分校集中学习，许多人在会上检查本单位、本人的所谓右倾思想，杨晦却不随声附和，他根据一九六一年通过的《高教六十条》的精神提出异议。一时议论纷纭，与会者感到惊奇，他的发言被摘录在“简报”上，成为批判对象的材料。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北京大学参加的会议，而且只参加了前半，这会议后来怎样结束的，我就不清楚了。另一件是一九七〇年七月，我将去干校，决定从燕东园搬出，在院子里遇见杨晦，我向他说，我要到干校去了，他语重心长地只说了三个字：“好好干。”

一九七二年，我从干校回来后，每年都到北京大学去看他一两次。见面时他总是向我打听过去的朋友和熟人们的情况。他先后患有比较严重的白内障和青光眼，经过两次手术治疗配好眼镜后，又能顺利阅读，有时读书直到深夜，并继续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他的坚强性格没有因为多病而减退，他

坚持劳动，夜里失眠从来不服用安眠药。最近几年他则一再表示，希望能有较长的时间，和我深入地谈一谈心；姚可昆也常常提醒我，“我们去看看慧修吧”（慧修是杨晦的别号，我们在家里总是这样称呼他），但由于彼此住的地方距离太远，挤不了去北京大学的公共汽车，以致一再拖延，得不到适当的时间。今年四月十九日，我和可昆利用在北京大学开会的机会，晚饭后去看过他一次，他这次显得神情衰弱，谈话虽不象往日那样有力，但还是思路清晰，问这问那。我们认为他是晚间疲倦了，不便久坐。临分手时，可昆还说，过些时请到我们家里住几天，就可以畅谈了。不料不到一个月，他的心脏就在五月十四日停止了跳动。我和杨晦经过多次离别，临别时或别后他都给过我宝贵的赠言，可是这最后的一次，当我和可昆在他逝世前两天到医院去看他时，他已昏迷不醒，哪怕是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也没有从他嘴里说出，这真是最大的遗憾。

这个癸亥年无言的永别，教我怎能不想起这六十年间与杨晦的交往呢？因此我不厌其详地写了些对别人也许觉得多余而自己却难以忘记的往事。但意犹未尽，我还要作个重要的补充。陈翔鹤在一九三三年写过一篇《关于“沉钟社”的过去现在及将来》，里边提到，他和陈炜谟于一九二三年底或一九二四年初由于我的介绍认识了杨晦，他们曾邀杨晦参加浅草社，杨晦是这样回答的：“同你们作朋友我是很高兴的，不能加入团体，我觉得我自己是太不适宜了，因为我不加入则已，一加入便要彻底地负责，而负责于我自己是很苦的。”这段话也显示出杨晦对待任何一件事都认真负责，他能够做的，只要承诺下来，就负责到底，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绝不轻于然诺。他对于

《浅草》从不过问，连一篇作品也不曾在上边发表过。可是等到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编《沉钟》周刊，一九二六年编《沉钟》半月刊，直到一九三四年《沉钟》停刊，他就全力以赴，不仅为刊物写许多文章和创作，还给以经济支援，有时甚至独立支撑。他创作的剧本，除去一九二三年前写的一部四幕剧《来客》登载在北京《晨报》副刊外，五部独幕剧和一部五幕历史剧《楚灵王》都是在《沉钟》半月刊里发表的。他的独幕剧以底层社会为背景，用极为精练的笔墨描绘人间的不幸和在不幸中各种各样的人们内心的活动。他善于不用过多的对话而是用气氛烘托出人间的悲剧，但也不放过旧社会制度下产生的恶习和险诈。他纯熟地使用北京和东北的方言俗语，有时也让自然界的现象起着象征作用。其中以《老树的荫凉下面》和《除夕》写得最成功，也最为感人。这五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独幕剧，在二十年代陈大悲式庸俗的所谓社会剧的余风未泯时，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时诗人朱湘在他一九二七年办的个人刊物《新文月刊》第二期上写过一篇评论杨晦戏剧的文章，他说杨晦的戏剧“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在近来的文坛上无疑的值得占有一定的位置”。他独具只眼，把杨晦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剧作家约翰·沁孤并论（我前边提到过，杨晦当时是很欣赏约翰·沁孤的）。在列举剧中的优点和独到之处，并指出一些缺陷后，他在文章结尾处说：“我十分知道，老树荫下这出戏是决无排演之可能的，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座露天的戏台，我们自己作它的开明的观众，来赏鉴它的真美。”后来这五出独幕剧于一九二九年印成单行本出版，列为“沉钟丛刊之五”，题名《除夕及其他》。书里引用的题词中有《被幽囚的普

罗米修士》和《约伯记》中的名句，这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两部名著的热爱。唐弢在四十年代写的《书话》里说，在“沉钟丛刊”中，他最喜欢杨晦的《除夕及其他》，但他并不把它看作是一本戏剧集，他这样说：“各篇都用对话体写，如独幕话剧，而充满散文诗气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

历史剧《楚灵王》写于一九三三年。《楚灵王》与那五篇独幕剧不同，它规模宏大，写一个野心勃勃的楚灵王，不择手段，用暴力和欺诈侵吞陈蔡，围攻徐城，自信问鼎中原，指日可待。当他盛时，目空一切，所向无敌；一旦叛军四起，他逃亡荒野，自缢而死。这部戏典型地描绘了古今中外所有暴君胜利时颠狂的妄想和穷途末路时怯懦而凄惨的心情。剧中还穿插着悲剧性的小故事，如唐娥由于腰粗，得不到好细腰的楚王的宠爱而自杀；众叛亲离之后楚灵王被申亥收容在家里，他死后申亥还把自己两个天真无邪的女儿给他殉葬。这些故事，作者若是用他写《除夕及其他》的笔法来写，都可以独立成章。

那五篇独幕剧和《楚灵王》都发表在《沉钟》半月刊里，也可以说是为《沉钟》写的，正如他自己说的，加入一个团体，便要彻底负责。《沉钟》于一九三四年停刊后，他是否有过其他的戏剧计划，我不知道，但是他再也没有发表过戏剧创作了。他本来可以成为更有成就的戏剧作家，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杨晦不象有些作家那样，把创作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认为有比写几个剧本更重要的工作。他在课堂上讲课，象是永不枯竭的泉源，引导许多青年去懂得人生的意义和革命的道理；他帮助朋友，关怀朋友的生活思想，有时比被帮助、被关怀的人想得还多；他担任行政工作，不随声附和，独立思考，

这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如此等等，都是他更重要的工作，而不是用笔能写得出来的。但是有些话、有些事记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心中，不断地发挥作用。所以朋友们都经常怀念他，惦记他。当年的学生，有的已是中年或接近老年，并在革命或生产战线上做出了成绩，也常常谈论他，若是从外地到北京来，往往不顾路途的遥远，都抽出时间到北大来看望他，感念他过去如何引导他们走上进步的道路。可以说，杨晦同志数十年辛勤的教育工作，比成为一个剧作家，对于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更有意义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于北京

溯往事，六十年

——追忆杨晦先生

臧克家

我得识杨晦先生，已经六十年了。

一九二三年暑假，我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头一年，住在北园，校舍清幽，纯乎乡村风味。庭院散步，时常遇到一位中年长者，面庞瘦削，略显弓腰，态度和藹，看上去有点软弱。见了我们微笑着问长问短，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这就是杨晦先生。我是先认识了他的人，才知道他的大名的。进了学校，喜欢文艺，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书刊，才知道杨晦先生和冯至同志等诗人、作家，创立“浅草社”、“沉钟社”，以后又主编《华北日报》副刊。我爱读杨先生的文章，也爱读冯至同志的诗，由于欣赏他们的作品，也更加尊敬、亲近杨晦先生的人了。

杨晦先生在我们学校附设的“文学专修科”任课，讲李清照的词。我们班次太低，无缘直接在课堂上受到他的教益。但他的文论，他的剧本，他领导的文学社团，给我的启发与诱导，成为我逐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鼓舞力量之一。直到今

天，年近八十的我，回忆文坛旧事，追溯个人漫长的学习创作过程，《浅草》、《沉钟》这些名字，对我是多新鲜，多亲切呵。

我们学校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革命活动、文艺活动，都十分活跃。成立了“书报介绍社”，向上海、北平订购大批革命书刊，这无异向几百同学心中撒火种。校长办学开明，教师思想进步，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文学专修科的同学，文艺修养都相当高，有的同学常在《洪水》等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学校里每周出版一张校刊，发表一些文艺创作。学校里文艺空气这么浓厚，原因非一，可是杨晦先生与有力焉，我与我的同班同学邓广铭同志可以作证，李广田同志可惜于十年动乱中遭受折磨而去世了！

人生如漂萍，聚散两无常。一别二十载，生死两茫茫。

一九四二年，我与杨先生在白雾弥漫的山城重庆，又重新晤面了。那时，杨先生住在赖家桥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眷属宿舍里，我和我爱人郑曼去拜望他。他住着两三间小平房，四面大野茫茫，门前向日葵成列成行，因为少见太阳，黄色的圆脸，没有定向地歪斜着。一见面，显然有点意外，杨先生兴奋得摆动着头，腰微微弓着，满面的笑容透露出内心的欢喜。姚冬先生，赶忙去买了大块肉来，杨先生在土地上劈柴生火，菜肴无多，大块吃肉，且吃且谈，其味无穷。在当年的重庆，《红楼梦》虽然不象今天成为一个热门，但文友相聚时，也多以它为话题。杨先生对一般同志贬抑薛宝钗，不以为然。他说：薛宝钗又有什么不好？当父母的给儿子找个媳妇，选中薛宝钗是情理所当然的。当时文艺界的同志对列甫·托尔斯泰与高尔基各有自己的看法，杨先生认为：托尔斯泰是伟大作家，谁也得承